

我在何方

周德义 著

一分为三论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何方？”这是自古以来人类不断追寻而又深深困惑的问题。本书从这亘古的疑惑切入，借助传统文化精髓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以“一分为三”所论及的“关于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态”、“关于存在状态的转变”、“关于最佳状态的确认与‘适度’的关系”等论题，对人类自身的定位和对万物的认识找到了新的界定方法和解读方式。

湖南人民出版社

B024

33

周德义 著

我在何方

一分为三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周德义 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438-3148-1

I. 我... II. 周... III. 哲学-研究 IV. 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049 号

责任编辑:李文君

装帧设计:聂 俐

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

周德义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290,000 印数:1—5,000

ISBN 7-5438-3148-1
B·76 定价:24.50 元

□序 I

不久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寄给我一本由湖南省教育厅周德义同志撰写的专著《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的清样，嘱我为该书作序。我对书中所论的问题没有研究，本想婉言谢绝，但继而又觉得这样做不太礼貌，故只好静下心来，把书稿通读了一遍。读后感到这是一本确有见地的好书，写一点读书心得也未尝不可，故不揣冒昧，写几句话权充为序。

应该说，“一分为三”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既古老而又年青的话题。之所以说它古老，是因为对于这一命题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研究了它。《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这些都说明，

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相当丰富的体现。之所以又说它年青，是因为好像人的天性就好二分法，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敌人，一部世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无一不是一部剥夺史、压迫史、战争史。在我国亦有一段相当长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阶级划线，搞“两个凡是”，弄得人惶惶不可终日。直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人方才又恢复了对中断了二十几年久违了的一分为三思想的研究。今日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可谓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许多专家、学者，对它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据了解，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历史研究》主编庞朴先生等就曾对它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真是见仁见智，见山见水，莫衷一是。这些对于推动人们从二分法的机械的思维定势之中和禁锢之下解放出来，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因此，我以为，对“一分为三”理论的深入研究，既有学术史资源可资借鉴，又是“一分为三”这一哲学思想不断发展的需要。

《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的著作者周德义同志，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原来主要从事生物学和自然辩证法方面的研究，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近几年来，他对“一分为三”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担任国家公务员的繁忙工作之余，还在湖南师大等几所大学作兼职教授，潜心甚至于可以说是醉心于“一分为三”理论的探讨，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数十篇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并在大学作“一分为三”专题讲座，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力作《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一书。作为湖南师大的老教师，我自然为之高兴并受到鼓舞，也感到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我以为,《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一分为三”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分为三”的提出到发展过程,从“一分为三”的理论框架到基本内容,从“一分为三”的基本范畴到实践运用,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表明作者对“一分为三”理论有了整体上的把握。作者对“一分为三”规律性的论证,涉及到了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人类社会诸方面,运用了数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论证非常全面、系统和丰富,说服力强。这无疑得益于作者毕业于生物学、化学专业,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二是理论观点比较前沿。该书对理论界认为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都作了认真的回答,如“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一分为多”的关系问题,中间状态或者第三者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一分为三”理论的实践性问题,以及对“一分为三”的理论阐述表达的问题,等等。作者对这些前沿问题的探讨不乏真知灼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尝试性地用数学语言提出了“一分为三”理论模型,对这一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的颇有见地的新概括。可以说,作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和走向的了解,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作者对这一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和理论体系。三是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一分为三”是思想方法,也是工作方法。因此,作者十分重视这一理论的实践基础。在构建理论框架之初,就从实践中引出理论观点;全书用大量篇幅对“如何运用‘一分为三’”做了具体论述,如“关于构造动态的和谐的平衡状态”、“关于存在状态的转变”、“关于最佳状态的确认与‘适度’的关系”,以及“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一分为三’的关系”，等等，都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而使“一分为三”理论为人们从事实践活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此外，作者对中国古代哲学如老子的“持中”思想、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佛家的中道观所包含的“一分为三”的思想所做的分析和发掘，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和精髓的深入探究，都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或层面来诠释或拓宽中国哲学思想。同时，作者也是把一分为三作为一个窗口，展示自己在认识论、价值论和人生观方面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成果。四是结构严谨，文字流畅。作者坚持严谨求实的写作态度，既注意理论结构的完整，又兼顾内容的新颖丰富和文字表述的通俗易懂，这为阅读者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都是难能可贵，应予称道的。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的“八七”讲话中，提出并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的重要思想；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又论述了“五个高度重视”的重要思想；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又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高度概括为两个“不可替代”——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总结了我国在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经验，也体现了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声，它昭示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春天的到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它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这一领域里的那些全局性、前瞻

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乃是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周德义同志的《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一书的出版，我以为是值得重视的。我相信，这一可喜的研究成果的问世，对我国“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的深化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是为序。

唐凯麟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日于岳麓山下

我
在
何
方

□序Ⅱ

由于工作和爱好的缘故，近几年里，我连续读到《湖南大学学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和《求索》等学术刊物上周德义同志关于“一分为三”的系列文章。作为周德义同志的朋友，一方面对其作为国家公务员能写出如此专深的学术论文而感到惊讶，一方面也为其能在市场经济的涛声之中安于寂寞、穷究学问的精神而深深感动，同时，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萌发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向周德义同志进言：“不妨写一本专著出版。”

真没想到，他这人干学术也像干行政一样——先做后说：没多久就拿了一叠早已发表的一分为三的系列论文和专著送来，说是要我写篇“序言”。

此时，我的态度也“一分为三”了：写吧，怕人家说外行为内行的书写序言；不写吧，又怕人家说“行家信任你，你还不懂味”，于是乎，只好采取“三”分之“中”的态度——通过研读

周德义同志的著作来力求客观地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于是乎，就有了如下的内容——

—

“三”是数量多与少的分界点，三分的方法在各科学领域中广为应用，随处可见。此足见“一分为三”具有基础性、普遍性。

数学中，最简单的数分成正数、零和负数。几何学上，三点（不在同一直线上）决定一个平面。

物理学的原子结构研究证明，原子是由带正电荷的质子，不带电荷的中子和带负电荷的电子构成的。物理学本身分成宏观物理学、微观物理学和介观物理学三个部分。至于物有三态、体有三维更是常见的。

化学已经证实，物质溶于水溶液或其他稀溶液中，不论这种溶液是酸还是碱，其中都存在着已发生电离的氢离子（ H^+ ）、氢氧根离子（ OH^- ）和没有发生电离的水分子（ H_2O ）。液态物质呈三性：酸性、中性或碱性。

生物学发现，生物进化过程中有中间类型、过渡类型存在。如始祖鸟，具有爬行类和鸟类动物特征的过渡状态。现代遗传学认为遗传信息（又叫基因）的流动是经过三种物质、三种环节实现的，称为中心法则，可表示为下式：

复制 转录 翻译

$DNA \rightarrow DNA \rightarrow mRNA \rightarrow Protein$ （性状）
基因的复制 基因的表达

我
在
何
方

人类社会研究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把中国农村阶级的基本结构，分为封建制阶级（地主、富农）、被剥削被压迫阶级（雇农、贫农）和中间阶级（中农、小地主），在分析小资产阶级时，他把他们划分为占少数的“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大约占半数的持“中立的态度”者和“数量不小”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三部分。他把国际关系事务构成，划分为“三个世界”的论断，为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新的时期的指导思想。

“一分为三”的指导思想，并不是无中生有。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分为三”，即中庸占据重要的基础地位。

儒家思想从汉代以来一直是我国封建文化的主流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中庸之道，即“一分为三”。我们从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经书典籍《周易》、《论语》和《中庸》中不难发现。

《周易》认为，生生不息，变化不已，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易传·系辞下传》道：“日往则月来，月入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易传·彖辞下传》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从日月的运行，寒暑的更迭，屈伸的变化现象之中归纳出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事物是一分为

三、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产生、发展、亡退的三个阶段，中间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变在其“中”，妙在其“中”，功在其“中”。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著。孔子认为中庸是最主要的德行。中庸与过、不及构成了事物的三分，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度”。怎样才能达到中庸呢？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第九》）“叩其两端”法，即从正反两面入手，以期弄清楚矛盾的两个方面，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解决矛盾。孔子教导学生，交友应交正直、诚实、见闻广博的朋友，不与逢迎谄媚，当面恭维背后毁人及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自己的生活爱好应当有所选择，“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逸乐，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待人处事要慎言。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十六》）孔子认为，人的才智、礼仪与仁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偏废的重要条件。

《中庸》是后人对孔子一分为三的中庸思想的整理、挖掘和发展，探求的是“君子之道”。《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道，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他将中庸之道的意义提到天地万物根本法则的高度，拓展为宇宙的终级大法。并且，中庸是一种思维方法，是做人处事的原则，是一种价值观。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

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道家以老子的思想为基本思想。老子的“道”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和一分为三的思想。归纳起来，道家的“守中”有三：一是在时间的维度上，要求顺势而为，伺机而动；二是在空间的维度上，要求抱一守雌，变化有度；三是在时空交互运动的结合上要求法道自然，变在其中。老子认为，“不为——有为——无为”是人类认识事物即得道的三种不同的方式。“无为”是一个哲学范畴，无为即无所不为。以无为的态度去处理事务，就没有处理不了的问题。“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道”也是适度，所谓适度，是指一定区间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即是不能上下，不能左右，不能进退等等。适宜为度。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老子·三十二章》）。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宗教，它尊奉“三宝”即佛、法、僧。佛典由经、律、论即“三藏”三部分构成。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之后，经同化，与儒家、道家思想合三为一。佛教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认识，二是对宇宙的认识，三是对万物本质的认识。中道观是佛教理论的核心。中道观认为，诸法平等空性，超越了一切观念，非有非无，泯绝一切差异，不可言说，乃是中道直觉之境。此缘起性空的空境，是“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的境界。故对之既不能执“有”，也不能执“空”（无）。只有“遮破二边”，把“空”和“有”的执着都否定掉，“双遣两非”，才是中道。

三

“一分为三”作为基本的思维方式，重要的哲学范畴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的，实质上，它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分为三”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联系性的特点。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事物到事物内部的诸方面，广泛存在着“一分为三”的客观现实，而物质运动的基本过程都是按“一分为三”的方式进行的。经历着从产生、变化发展到消亡的“一分为三”的辩证过程。而“一分为三”作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规律。

“一分为三”符合质量互变规律。从质量互变的状态看，“一”仅仅只分解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认识、两个生死搏斗的阶级、两个根本对立的事物等，这种绝对的态势的出现和存在一般是极其的短暂和偶然的事件，可以说是爆发性的。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事物是以一分为三的形式出现和存在的。“三”是事物最稳定的结构，也是事物变化的起点和归宿。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生生不息，以致无穷。毛泽东说过，任何时候，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阶级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必定有中间派存在。从质量互变的过程看，在事物变化的过程中总存在一个中间状态。事物从质变到量变再到新的质变正是一个三分的循环往复的变化过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道：“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他认为“中”是质变的转

折之点，事物发展了这一点，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分为三”符合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三的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的矛盾性。整体“一”是“三分”存在的前提，“三”是“一”存在的必然。整体本身是矛盾存在的表现，是一定条件的集中反映。整体存在，缺一不可。整体既是与外界的统一，也是自身内在的统一，是内部与外部矛盾的高度统一。

第二，事物内在的矛盾性。事物普遍地具有内在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常常是按照一分为三的方式展开来的。事物三个方面的存在是矛盾的体现，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依据，是物质的规定性。事物内部三个方面间具有特殊的矛盾关系，包括对立面之间的矛盾；对立面与中间面之间的矛盾。

第三，事物间的矛盾性。一事物与它事物（环境）的关系通常也遵循一分为三的规律性，有相容的，也有相异的，还有并列平行的关系。其中相容者又包括同一重迭的关系、部分交叉的关系和属种关系。简而言之，“三”是“一”中的“三”，“一”可以被包容在更大的“一”之中。

否定之否定意味着事物连续经历两次否定，必定存在着两次转变三种状态。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

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不停息的，也都是波浪式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一分为三认为，一个事物完整的发展变化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初始阶段、中间阶段和终结阶段。一切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的内部产生出来的，当新事物否定旧事物后，新旧事物之间有着一确定的界线，这就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问题。在事物发展的过程

中，必定存在一个阶段，肯定的因素与否定的因素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否定之否定不是简单的重复或返回，而是发生在更高阶段的质的变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数学上的零及其与正数、负数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辩证论述，他指出：“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限，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惟一真正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

四

一分为三来源于几千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合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今天来探讨它，确实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指导我们的实践不断深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基本方法。一分为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使“中庸”获得了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获得了新的生机。“一分为三”理论建立在“一分为二”的基础上，认为“一分为二”是其特殊的形态，在事物矛盾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中间阶段或中间状态，即中介。它是对西方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命题“非此即彼”的纠正和发展。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方互为中介”。研究一分为三，不仅要认真研究矛盾对立两极的状况，研究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而且要认真研究对立面之间的“中介”、“亦此亦彼”的状态，尤其要认真研究一个事物由此转化为彼的“临界点”和“关节线”。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揭示、催化和实现临界点和中间状态的转变。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是运用一分为三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典范。实践中，他更是善于抓住关节点，使事态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如解放战争中，石家庄战役后，他及时而果断地指出，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略进攻阶段，新中国的建立指日可待，蒋介石即将垮台。由此，抓住有利时机，及时总结经验，准确把握未来，在杨家沟召开了党的扩大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及时将全党全军的工作转入新的阶段，取得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主动权。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度”，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现代科学的发展，无不渗透着“一分为三”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论的运用，今后，随着“一分为三”的哲学观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必将更广泛、更深远地指导人们的科学研究，加速推动科技的发展。

从周德义同志的著作中寻求的上述力求客观的“介绍”，